

七七蘆溝橋事變四十年

陶希聖

一、最後關頭與最後勝利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軍在北平之南，長辛店一帶，舉行其所稱的演習，藉口挑釁，攻擊我方駐守蘆溝橋的隊伍，並強制侵入宛平縣城，隨即繼續與我軍衝突。是為七七事變，亦稱蘆溝橋事變。

七月十七日，蔣委員長在蘆山談話會發表嚴正聲明，其中指出：

前年五全大會，本人外交報告所謂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跟着今年一月，三中全会對於「最後關頭」的解釋，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。我們既是弱國，如果臨到最後關頭，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，以求國家生存。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。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，便是整個投降、整個滅亡的條件。全國國民最要認清，所謂「最後關頭」的意義，最後關頭一到，我們只有犧牲到底、抗戰到底。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，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。

自九一八事變之後，南方有上海一二八之役，北方有錦州之役、榆關之役、長城之役，更有冀東特區乃至華北特殊化的圖謀，而天津與北平一帶，更有豐臺的佔據與長辛店的示威。於是我全國國民都知道對日抗戰已無可避免，至於何時何地及何事纔是犧牲的最後關頭，則翹首仰望蔣委員長的決定與宣佈。直到蘆溝橋事變爆發，蔣委員長在蘆山談話會，向全國國民宣佈：

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；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。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。

全國國民與國軍鬱積了六年的憤慨與期望，至此一朝激發，一致奮起，從此堅持戰鬥，至八年之久，終於博得最後勝利。

二、國民革命兩面作戰的形勢

十九世紀中葉，帝俄以其哥薩克游擊隊與鐵路政策，經亞洲北方鐵路東進，到達我新疆、蒙古及東北；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諸國以其炮艦政策，經亞洲南方海路東進，到達我沿海及內河諸港口；從事商業、鐵路、航行諸般利權之競爭。甲午戰後，侵略者更進而強求租借地，劃分勢力範圍，幾乎演成瓜分國土之禍。二十世紀之初，美國首倡，英國附和，採行對華門戶開放領土完整的政策，但日俄兩國仍然懷抱領土慾與獨霸企圖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，西方諸國悉力作戰於歐洲戰場，無暇東顧，日本乘機逞其由蠶食而鯨吞的野心。從青島而山東，自關外而關內，最初以二十一條為其要求的總目，最後以軍事協定為其行動的準據，再加以鐵路、電信、軍火、軍費，各項借款與墊款為其壟斷財政經濟的手段。由表氏帝制以至於軍閥割據，大抵以帝國主義者為其支援與背景，日本為禍尤為慘烈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西方諸國轉向東方，再建國際均勢，於是華府會議，締結九國公約，重申門戶開放領土完整的原則，稍戢日本的狂圖。但在此時，列寧取得俄國政權，建立蘇維埃政府，並組織共產國際，推行其所稱「世界革命」。

蘇俄承襲帝俄侵略主義的傳統，若是西進為歐洲列強所阻截，便回頭東進亞洲。共產革命既失敗於德國，而紅軍東征又失敗於波蘭，於是共產國際以中國為箭靶，設立中國支部，即中國共產黨。列寧交給中共的口號

是「東方民族革命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，聯合起來，打倒帝國主義」！這口號是響亮而中聽的，但是其中隱藏着列寧從中國，經印度，到歐洲的大迂迴戰略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東方的國際形勢如此。中國國民革命從北伐至抗戰便是在這個國際形勢之下，必須打破對日與對俄兩面作戰的困境，方纔能夠克敵制勝以竟全功。

三、法西斯、納粹與布爾塞維克

十九世紀是海權時代，又是民主主義時代。

以英國為首，西歐一隅之地稱霸於這個世界。其所恃者為機器工業以支配世界市場，船堅炮利以掌握航海要路。

自美國獨立戰爭，法國大革命及英國和平革命以來，民主主義風靡全球。

西方諸國的機製工業品輸入中國的時代，也就是民主主義輸入中國的時代。鴉片戰爭乃至英法聯軍、中法戰爭，更繼之以甲午戰爭，而那拉氏仗義和團以滅洋扶清，又招致八國聯軍的大禍。重重的不平等條約加擔於我們廣土衆民之上。直使中國在經濟上，淪為國際予取予求市場。在文化上，固有事物百無一是。歐洲的各種主義皆傳佈社會而其影響及於政治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一方面，蘇聯布爾塞維克風起雲湧。另一方面，義大利法西斯及德國納粹主義，相繼勃興而與布爾塞維克抗衡。這兩種思想，兩個教條，也是兩項運動，兩路推行於世界。民主主義反而黯然無光。

同時，大戰後的國際政局不復是戰前的舊觀。英國的世界霸權漸見衰退而美國新起於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。西歐有賴於美國的支持，日本也顧慮美國的壓力。而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尚未能建立起來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二十年武裝和平，終竟破壞在納粹法西斯與布爾塞維克的手下。

四、暴力哲學與福利哲學

民國二十年代，即一九三〇年代，在蘇俄是史達林清黨整軍的恐怖政治時代。在義大利就是墨索里尼法西斯打殺共產黨的時代。在德國也就是希特勒納粹主義打殺共產黨以及驅逐猶太人的時代。

納粹與法西斯是反共產主義的。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是反法西斯主義的。兩個主義與兩種權相對抗乃至相打鬥，自是不容疑的事實。

但是這兩個主義，兩項運動，兩類組織，屬於同一範疇。就其思想來說，皆是暴力哲學。就其政治體制來說，皆是極權主義。

納粹法西斯皆反對民主政治，皆是壓制人民的自由與人權，皆不容民主主義福利哲學存在其以極權暴力控制的領域之內。

當時有識者將布爾塞維克俄國與納粹主義德國作一比較，指出一個顯明的徵象，就是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化，德國是國家社會主義化。兩者同屬一個反民主政治與福利哲學的極權主義與暴力哲學的範疇。

五、日本少壯軍人與中國共產黨徒

民國二十年代，即一九三〇年代，納粹法西斯主義與布爾塞維克這兩種思想與兩項運動，皆傳到東方。在日本，所謂少壯軍人接受了納粹法西斯主義。在中國，共產黨原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。

當時，日本少壯軍人以反共為旗幟；而中國共產黨徒以抗日為口號。但是兩者皆屬於極權主義暴力哲學的範疇。兩方皆以分裂中國，推翻國民政府為其鬥爭的目標。

當時最顯明的事實，是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，要求我國國民政府「共同防共」。同時，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向察哈爾、河北省，尤其是北平政分會、軍分會或冀察政務委員會，歷次提出的條款，皆標榜其所謂「共同防共」。

中共面將着日本侵華的局面，眼見得一般國民反日的情緒與排日的運動，也趁勢提出「人民國防聯合政府」的主張，又唆使所謂「抗日救國聯合會」打出「抗日不反共」的旗幟，喊出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的口號，更裝點人民陣線為「抗日民族陣線」，其後又改稱「抗日民主陣線」。中共黨徒自誇他們是最抗日而且抗日到底。

但在這顯明事實的另一面，日本每一步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，與中共每一次，劫掠與叛亂的武裝暴動，互相配對，如桴鼓相應。

在日軍佔錦州，取榆關，攻長城的時期，中共沿長江流域開拓了七個所謂「解放區」，並在贛南瑞金設立所謂「蘇維埃政府」，擴大其武裝叛亂。

六、五一五與二二六事件

何謂少壯軍人？日本軍，特別是陸軍，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，官階在少佐以下的軍人，是為少壯軍人。少壯軍人何以發生干政的野心？那便是一般中下級軍事幹部，受了極權主義暴力哲學的時代潮流的沖激與影響。部隊長聽從幹部，軍部又聽從部隊長，首相受命組閣非得軍部的同意不能組成，軍部三長官又可超過內閣而上奏天皇，天皇持有統帥權以決定軍事政策與方針。

這種事勢發展之所至，內閣對於軍部失却指導權，軍部對於部隊也失却控制力。經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五一五事件，及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二二六事件，少壯軍人的氣焰，不可遏止，而軍人控制內閣而擴大侵華戰局的趨勢，顯已無可延緩與遏制了。

七、五次圍剿與抗戰準備

國民政府第四次圍剿匪共的軍事部署，因長城之役，調兵北上增援，遂致延誤。長城戰後，日軍侵略鋒刃轉向河北，而推行其華北五省自治運動。所謂冀東特區、蒙疆自治，以及華北特殊化，日方着着進逼，我方步步為營，一面談判，一面抵制。平津學界與報界反自治與反分裂的鬥爭，也助長冀察當局談判能力與抵制決心。

就在這一段時間，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戰事，至二十三年底，獲得全面勝利。瑞金克復，匪軍化整為零，突圍西竄，經湘西、貴州、川北、至陝北，毛彭餘匪只得二千人，再加以張徐殘部，朱德散兵，連同劉志丹土共，也不過五千人。中共既已解除其武裝，也就失却其左右時局的影響力。

於是 蔣委員長一面與蘇聯談判復交並簽訂中蘇互不侵犯協定；一面接受中共「無條件合作」的要求，並容許中共在四項原則之下，共赴國難。

八、敵乎？友乎？

五次圍剿戰事初告成功，抗戰準備積極進行之際，蔣委員長仍披肝瀝膽，向日本國民提出勸告，題目是「敵乎？友乎？」署名者是徐道隣。先在日本「外交評論」發表，隨即由國內報紙刊出。

蔣委員長的勸告，大意是日本侵華之戰不會勝利，即使勝利，仍為失敗。中國抗日之戰必將勝利，但勝利終歸於失敗。

蔣委員長更明白警告：中國抗戰，必將堅持到底。中日兩國兩敗俱傷，將有第三者乘機取利，東亞大局也就不堪設想。

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。日本少壯軍人及其所推重的軍閥，依舊由東北進華北，體行其分裂中國的野心狂圖。

九、西安事變的影響

一般總不免於懷疑，西安事變所加於抗戰的影響何在？周恩來在事變中對 蔣委員長有什麼要求麼？蔣委員長在蒙難中對周恩來有什麼諾言麼？如果沒有西安事變，蔣委員長便不會提早抗戰麼？

因為陳立夫先生奉命往歐洲，經德國，到波蘭，與蘇聯談判；又奉命派員往香港，與周恩來接觸，以及周恩來偕同潘漢年到上海，轉南京，見陳立夫先生，訂立共赴國難四項原則；這一切都是極端秘密的。

蔣委員長於對蘇與對共各有安排之後，方纔進赴西安，將以抗戰大計，曉諭張學良，安定東北軍的人心。不料西安事變突然發作。

在事變中，周恩來往西安，先見蔣夫人，陳述「非 蔣委員長領導，不能抗戰」，以及中共擁護 蔣委員長，共赴國難的決心。隨即獲准晉見。周恩來只說一句話：「抗日不反共」。蔣委員長也只答了一句話：「回南京再說」。

西安事變的重大影響，在於 蔣委員長不受任何要挾，不作任何諾言，保持統帥的尊嚴，維護民族的人格。

西安事變的重大影響更在於蔣委員長出險還都，薄海騰歡，舉國一致表示擁戴的熱忱，並申明抗日的志嚮。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洋溢於億兆民衆之間，直使日本侵略者與中共黨徒同樣爲之戰慄。

日本軍閥分裂中國，規取華北的圖謀與行動，更加急激與兇猛。

中共聯絡地方軍人以困擾國民政府，催促國軍獨力抗戰的陰謀，亦即其所謂「人民陣綫」的戰略，至此徹底粉碎，計唯有憑藉其「服膺三民主義」，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」，「取消紅軍名義，聽候收編」，「撤銷陝甘寧邊區」，與「放棄階級鬥爭」四項原則，以圖生存與發展。

十、七七事變與最後關頭

時局演變至此，全國軍民只是等待着蔣委員長以何時、何地、何事件爲最後關頭。

對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，以及將中共收編爲國民革命軍，我國族兩面作戰的困境今日解除，我軍民集中意志與力量於動員抗戰的時機今日來到。

幣制統一，粵漢路通車，如是種種，日本侵略者所覬覦的建設事業，大抵告成。

國家統一雖有其物質的條件，但民族精神的力量更大於所有物質條件的總和。

於是日軍既佔據豐臺，又進攻蘆溝橋，侵入宛平縣，更將掠奪北平，分裂華北；當此橫逆之來，蔣委員長在各黨領袖及各界名流聚於一堂之廬山談話會，向全國軍民宣佈：「和平已到絕望時期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，並發出號令：「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皆有守土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」。

我們在蘆溝橋事變四十年之七七，紀念中華民國抗日作戰的開端，試即重複上述的一句話：「國家統一雖有其物質條件，但民族精神的力量更大於所有物質力量的總和」，作爲本文的結論。

九年國民教育

司琦編著

定價三〇〇元

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，爲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。本書依其發展過程，分爲實施之背景、經過及檢討三個階段加以敘述。在正文之前，恭錄蔣總統對於九年國民教育的訓示；在本文之後，附錄九年國民教育的重要文獻。

全書共計三篇廿一章，凡九年國民教育實施背景、規劃、立法、經費籌措、學區劃分、校舍建築、課程、教材、師資、以及金馬地區實施情形，俱因作者負責實際責任，而有深刻而親身的體認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
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

